

翻譯研究方法層面常見問題之探究——以具體研究個案為例

張 瑞* 李忠慶**

摘 要

近三十年來，翻譯研究在中國蓬勃發展，並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由於其具有跨學科研究的特性，不同專業背景的學者將視點投向這一領域，從各自的學科視角出發，運用不同研究方法對翻譯現象或問題進行探索，進一步促進了該領域的發展。然而，與此同時，也暴露出學者中間存在於研究方法層面的一些不足之處。本文以嚴復、林紓和魯迅的翻譯為例，從理論指導和非理論指導下的具體研究個案入手，對當前中國大陸翻譯研究中由於方法不當而導致的一些常見問題予以分析。同時，進一步探討這些問題背後反映出的中國譯學界在對西方理論的理解、運用以及學術規範層面與西方譯學界存在的差距。而此種差距在某種程度上，與中西學術傳統的差異及當前中國大陸的翻譯研究和翻譯學科教育的現狀有一定關係。針對此現狀，筆者做出相關建議，以期對中國的翻譯研究和翻譯研究方法課堂教學有所裨益。

關鍵詞：翻譯研究、研究方法、理論、學科發展、學術規範

*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China: A Case Study

Zhang, Rui* Lee, Tong-King**

Abstract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developed into a fledgling discipline. Due to its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it has attracted scholars from various backgrounds, who have explored translation phenomena from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However, methodology remains a weak link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common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by mainland Chinese scholars. Taking as a case example the topic of Yan Fu, Lin Shu and Lu Xun's translation orientations, it examines how scholars make unjustified claims based on erroneous applications of theories or inadequate evidence. The article further analyzes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se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cluding academic conventions in China, which in turn reflect other problems in translation education in China. The article closes by making recommendations to enhance methodological awareness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teaching.

Key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methodology, theory,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cademic conventions

* School of Chines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chool of Chines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 前言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翻譯研究在西方先後經歷了從語言學研究範式到文化研究範式的轉變。在此過程中，翻譯研究逐漸突破了語言學、比較文學等學科疆界，形成了一個具有確定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的領域（羅列、穆雷 2010: 11）。由於翻譯學本身具有交叉學科的特性，加之跨學科研究的思路倍受當今學界推崇，時下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從各自的專業視角出發，運用不同研究方法對翻譯現象或問題進行探索，為翻譯研究注入了不少活力，進一步促進了該領域的蓬勃發展。眾所周知，任何學科的研究都離不開科學研究方法的指導。翻譯研究但凡涉及到對數據¹的收集和解釋，如語料庫組建、數據分析、現象解釋等，研究者在實際操作層面不可能繞開「科學方法」這一因素（Tymoczko 2007: 143）。在翻譯研究領域，自上世紀末，學者中間方法論意識日漸凸顯，並圍繞翻譯研究方法展開一系列探索和討論（同前 147）。不少西方學者在此方面的研究值得關注，例如，安德魯·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2000）提出的三大翻譯研究模式（Models of Translation），安東尼·皮姆（Anthony Pym）（1998）關於翻譯史研究方法的討論，瑪利亞·提莫志克（Maria Tymoczko）（2007）針對翻譯研究中分類方法、驗證原則、實證因素與理論因素間關聯等方面的探討。²

過去三十年來，翻譯研究在中國發展迅速。大陸學者運用的研究方法隨之日臻成熟。早期研究者大多缺乏研究方法論意識，所著文字多為自身翻譯經驗、感悟的總結。其雖對翻譯實踐有所幫助，但缺乏理論維度的思考。

¹ 此處的「數據」泛指任何與研究相關的文本、圖像、語料等材料。

² 更多關於翻譯研究方法的討論可參見 Olohan (2000), Hermans (2002) 及 Williams & Chesterman (2002)。

之後的學者由於接觸較多的國外翻譯研究文獻，在研究中主動借鑒和運用國外的理論及研究範式，實現了翻譯研究從感性經驗總結向理性科學分析的轉變（許鈞、穆雷 2009: 87）。近年來，翻譯學學科意識在中國大陸範圍內不斷得到強化，大陸譯學界積極向國外同行取經，「使用統計分析、實驗證明、個案分析、調查研究、語料庫、有聲思維等輔助手段對翻譯進行定性研究、解釋性研究、探究性研究和歸納研究」（同前）。然而，就目前情況而言，「國內學者在某種程度上對研究方法的認識尚不到位，研究生培養與學術研究缺乏正確的方法論指導」（同前）。下文即結合具體案例，揭示中國大陸學者中間在研究方法層面存在的一些常見問題及導致這些問題的緣由。同時，藉由這些個案來探討如何在具體研究中有效運用研究方法闡釋特定對象。

為方便討論及更有力地說明問題，本文對不同研究方法指導之下闡釋同一翻譯現象的研究個案展開分析、對比。後文探討的大陸學者的研究個案主要出自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該數據庫目前為全球最大的中國（大陸）期刊全文數據庫，共收錄有中國大陸地區 9800 餘種期刊，以學術和高等教育類期刊為主，內容覆蓋自然科學、人文科學、醫學等各個領域。就任一主題或研究對象，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可提供與之相關的中國大陸學者的中文期刊論文數量超過其他任何數據庫。由於本文探討的對象主要是大陸學者針對某一翻譯現象的研究，因此，選用該數據庫搜索相關學術文章，從中獲取的個案就數量和內容的豐富程度而言，都頗具說服力。

本文討論的研究個案均以嚴複、林紓或魯迅的翻譯為研究對象，重點關注這些個案如何對研究對象做以闡述並得出相應結論。論及清末民初的

譯者，康有為曾詩云「譯才並世舉嚴林」³。魯迅的文學貢獻雖主要集中於中國現代文學領域，但其翻譯觀亦對中國近現代翻譯史影響深遠。嚴複、林紓、魯迅在中國翻譯史上的地位及影響毋庸置疑，不少學者以他們的翻譯為研究對象展開討論。筆者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分別以「林紓（的）翻譯」、「嚴複（的）翻譯」、「魯迅（的）翻譯」為主題進行搜索，結果如下：

圖表 1⁴：

主題	林紓翻譯	嚴複翻譯	魯迅翻譯
期刊文章總數 (1991-)	207	222	212
核心期刊文章總數 (1991-)	45	64	60
相關核心期刊數量	31	46	37

³ 《庸言》第 1 卷 7 號載康有為所作《琴南先生寫〈萬木草堂圖〉，題詩見贈，賦謝》：「譯才並世數嚴、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喜剩靈光經歷劫，誰傷正則日行吟。唐人頑豔多哀感，歐俗風流所入深。多謝鄭虔三絕筆，草堂風雨日披尋。」

⁴ 由於本文著重探討近些年來中國翻譯研究的情況，尤其是翻譯學在中國大陸成為獨立學科以後的研究情狀，故筆者在該圖表中對特定主題期刊文章的統計始於 1991 年，之前的相關文章不予統計。圖表中的「核心期刊」指收錄進中國《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的期刊。該要目由北京大學圖書館聯合眾多學術界權威專家通過定量評價指標評定推出。圖表中的“CSSCI”英文全稱為“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即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 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開發，採取定量與定性評價相結合的方法，從中國大陸範圍內 2700 餘種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中精選優質刊物作為來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和 CSSCI 在中國學術界廣受認同，入選此二者的期刊在中國學界擁有較權威的影響力。《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08 年前由北京大學圖書館每四年評定一次，2008 年後每三年評定一次。CSSCI 每年根據刊物品質的情況，增刪、調整入選期刊。此圖表中關於此二者來源期刊的統計以 2014 年 5 月 25 日登入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的搜索結果為準。

此圖表內，有關「林紓（的）翻譯」、「嚴複（的）翻譯」、「魯迅（的）翻譯」的各主題期刊文章統計結果中，不排除有同一文章或期刊被其中兩個或三個主題同時計入的可能，因為同一文章可能談論或涉及此處的兩個或三個主題。

主題	林紓翻譯	嚴複翻譯	魯迅翻譯
CSSCI 來源期刊文章總數 (1991-)	36	50	47
相關 CSSCI 來源期刊數量	27	30	23
主題	林紓的翻譯	嚴複的翻譯	魯迅的翻譯
期刊文章總數 (1991-)	170	202	182
核心期刊文章總數 (1991-)	41	60	51
相關核心期刊數量	33	43	33
CSSCI 來源期刊文章總數 (1991-)	34	46	39
相關 CSSCI 來源期刊數量	25	28	21

如圖表所示，根據相關主題搜獲的不同級別期刊文章的數量及文章來源期刊的數量都很可觀。這些研究從多種角度切入，運用不同方法做出各自相異的解釋。因此，圍繞這一特定對象收集的研究個案無論就數量，還是所用研究方法與思路而言，都比較豐富。這樣不僅可以為本研究提供十分豐富的案例，亦可保證本研究的信度與效度。鑒於這些文章對此三家翻譯的具體探究各有側重，本文聚焦於它們對嚴複、林紓、魯迅的翻譯策略及其影響之下不同譯文語體風格的相關討論。嚴複是近代中國介紹西方思想之第一人，他以典雅的古文，尤其是「漢以前字法、句法」進行翻譯，譯文文筆雅馴。林紓筆下的西洋小說亦以文言譯成，其出色的史漢妙筆廣受時人稱讚。魯迅提出的「寧信而不順」的「直譯」、「硬譯」的翻譯主張在中國翻譯史上可謂濃墨重彩的一筆，其本人的譯作亦在此主張之下，呈現出與嚴、林譯文截然不同的面貌。針對嚴複、林紓、魯迅三家各異的翻譯策略和譯語特徵，在閱覽大量相關文章的基礎上，透過對不同級別期刊裡多個研究個案中具體切入面向及研究方法的探討，可以歸納、概括出存

在於翻譯研究方法層面的一些常見問題，達到窺一斑而見全豹的效果。同時，亦對具有較強信度與效度的研究個案予以分析、呈現，以期對翻譯研究方法的課堂教學有所啟示和助益。

2. 研究個案與常見問題分析

筆者以所用方法中有無理論介入為依據，將論者的個人研究大致分為兩類——理論指導型研究與非理論指導型研究。下文即透過對具體研究個案的分析，來指出每類方法指導下翻譯研究過程中應儘量避免的一些常見問題。

2.1 理論指導型研究

理論是「概括地反映現實的概念和原理的體系，是系統化了的理性認識的結果」⁵。它可以為我們認識事物提供系統性的視角，進而促進我們以特定方式理解或闡釋事物或現象 (Chesterman 2000: 15)。「翻譯理論是運用系統化的方式對翻譯現象進行概括得出的結論（一組內在相關的命題）；理論方法則是指運用一種已有的理論觀點或理論體系對研究對象進行說明和解釋的方法」（姜秋霞、楊平 2004: 10）。翻譯研究在中國經過兩次西化浪潮之後，大量西方理論在大陸和香港學者的共同努力下移植進中國，並由此導致西方理論主導大陸和香港兩地的翻譯研究（張南峰 2012: 162）。近年來，隨著翻譯研究在中國大陸獨立學科身份的確立，更多的中國學者將視點轉向這一領域。很多學者於研究中借用西方理論或研究模式，希望藉此與西方學界接軌。這一傾向本身無可厚非，但於翻譯研究中

⁵ 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 I，第 579 頁，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

引入理論應有章可循、有據可依。目前，學者當中介入理論進行的翻譯研究中，最突出的問題在於理論與研究對象貌合神離或強物就我。

2.1.1 貌合神離

任何理論的提出都基於特定的切入面向，各理論的適用範圍及具體功用也不盡相同。因此，運用理論對具體研究對象做以探討時，首先需要考慮的是所用理論能否真正為闡釋該對象提供合宜的切入點。有些學者在研究中引入的具體理論與據其對特定研究現象進行的闡述看似無懈可擊，但稍加細究，便會發現所用理論本原上並非旨在指導此類現象或問題的研究或與其並無本質上的關聯，意即所用理論無法為相關對象的研究提供合宜的切入角度。

針對案例中提出的魯迅提倡「直譯」策略的現象，部份學者嘗試從德國功能翻譯學派學者漢斯·弗米爾 (Hans J. Vermeer) 提出的目的論 (Skopostheorie) 之角度加以說明。例如，有學者說到，「從目的論的視角來看，魯迅先生一生孜孜不倦地從事翻譯工作，強調直譯，甚至於『硬譯』，積極倡導保存『洋氣』的異化翻譯策略，主要是緣於他想喚醒民眾、改變國民性以及提高和豐富漢語言的根本目的」(閻愛花 2012: 51)。這位論者在此例中對魯迅在當時歷史情境中翻譯目的的闡述不無道理。譯者採取一定的翻譯策略，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其翻譯目的，這一點也無可爭議。根據目的論，翻譯是一種基於源語文本的有目的的行為，「決定翻譯過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體翻譯行為的目的」，進一步來說，主要是譯文的交際目的 (Nord 2005: 35)。因此，乍看之下，例中的分析和結論與目的論的基本觀點十分吻合，但實則不然。論者在此忽略了最基本的一點。目的論作為德國功能翻譯學派代表理論的一支，本質上是一種指導實踐的應用型理論，具有明確的行為導向色彩。該理論的出發點在於透過對譯文交際目的及譯

文讀者預期的分析來指導譯者的具體翻譯實踐，而非旨在指導純學術研究。由此可見，這位論者將此種實踐指導型應用理論混淆成了指導純學術研究的純理論，因而，可以說該論者以目的論來解釋案例中翻譯現象，其最初的切入角度就存在偏差，更遑論理論指導名義下的具體闡述。若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鑒於所有翻譯活動或行為背後都有其特殊的目的或動機，目的論有可能被濫用為一種幾乎可用於解釋一切翻譯現象的「萬金油」式的理論。這種將理論庸俗化的做法不僅有悖與提出理論之初衷，也使得很多翻譯現象的闡釋在目的論之「翻譯目的決定翻譯策略」這一具有合理學術解釋身份之招牌觀點的掩飾之下流於膚淺，得出過於簡單化的結論，而對於那些真正構成或促成某一現象、問題的因素卻忽視不見或挖掘不足。

2.1.2 強物就我

一些論者闡釋特定翻譯現象或問題時，其引述的理論觀點其實是重新「加工」後的理論觀點，已偏離所用理論背後的真實原意。例如，有的學者這樣解釋嚴複為何用漢以前字法、句法進行翻譯，「以當代翻譯理論觀之，嚴複採用的乃是韋努蒂 (Lawrence Venuti) 所說的『歸化策略』，其目的在於消融西方社會政治思想的『異國外觀』。歸化 (domestication) 是與異化 (foreignization) 相對而言的……」(徐蕾、李里峰 2006: 110)。在韋努蒂的理論體系中，「歸化」與「異化」指向兩種不同的文化道德態度，並不同於具體的話語翻譯策略(郭建中 2008: 44)。譯者可以透過具體的翻譯策略，產生「異化」或「歸化」的效果。「歸化」意味著譯文透明、通順，同時，不同程度地抹殺翻譯本應傳達的差異 (Venuti 2009: 21)。而且，在韋努蒂看來，「歸化翻譯」與「異化翻譯」並不構成一對相對立的概念(郭建中 2008: 43)。在論及嚴複的翻譯時，韋努蒂本人亦明確表示「不認為嚴複的翻譯是歸化的翻譯，因為其傳播的思想與中國傳統的思想

根本不同」(同前 46)。因此,這位論者其實曲解了韋努蒂理論中「歸化」概念的本意,令其以話語翻譯策略的面目出現於對嚴複用爾雅古文翻譯的解釋,不免有強物就我之嫌。

有論者(張南峰 1998)運用埃文·佐哈爾(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統論(Polysystem Theory)來分析嚴複、林紓和魯迅三家的翻譯。多元系統論將各種符號現象,即符號主導的人類交際形式視為系統,並認為所有系統都是更大系統內的一部份,且處於動態變化之中(Even-Zohar 1990: 9-12)。翻譯文學為目的語文化中更大的社會、文學、歷史等多元系統的一個子系統,翻譯規範、具體翻譯行為策略受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地位及其他相關系統的影響(Even-Zohar, "The Position," 2000, 196-197)。這位論者在具體分析中引入「清朝末年,中國的文化多元系統因外國侵略而開始出現危機或者真空,於是需要藉助翻譯來填補」(張南峰 1998: 34)的歷史背景後,把嚴複、林紓、魯迅的翻譯放入中國語言文學這一大的動態多元系統內進行探討。其從「在危機初現之時,古文的語言文學系統在中國的語言文學多元系統中的支配地位依然穩固」的角度出發,指出古文「在嚴複、林紓以及他們的讀者的心目中依然至高無上」,並將他們的翻譯策略選擇與其所處時代的古文語言文學系統聯繫起來,進一步得出嚴複和林紓「必然要遵守目標文化的語言、文學規範,製造出『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甚高而『充分性』(adequacy)頗低(即是頗不忠實)的譯文來」之結論(同前 35)。論者在闡釋魯迅的翻譯時,採取了同樣的思路,以「新文學運動興起之後,古文的語言文學系統隨著儒學這個意識形態系統一起失去了支配地位——起碼在左翼作家的眼中是如此」的史實,來說明魯迅之所以提出「寧信而不順」的翻譯主張在於「要以『不順』的譯文作『進攻』武器,來改造中國的意識形態、文學以至於語言」(同前)。多元系統論反對將研究對象當做封閉的個別系統進行研究,主張將

其置於由多種關係組成的社會、文化等較大系統中予以考慮，探究其與其他系統之間的相互關係與作用。此個案中，論者透過分析古文語言文學子系統在不同時期中國語言文學整體系統中地位的變化，來解釋他們翻譯策略選擇背後的原因。這樣的切入角度和思路既與多元系統論的核心觀念契合，同時，也對根植於西方文化語境之多元系統論在不同文化語境中的普適性進行了某種程度的探索。

2.2 非理論指導型研究

雖然於具體的翻譯研究中引入理論，尤其是西方理論，是學者中間的一種常見做法，但這並不意味著理論介入是翻譯研究之不二法門。尚若不介入理論，對研究對象進行鞭辟入裡的分析及科學、嚴密的論證，研究結論亦會令人心服首肯。因此，不少學者在研究之中跳離具體的理論框架或視角，從社會、文化、歷史等面向切入，運用其他方法對相關事實進行舉列、分析來闡釋特定對象。有些學者即順此路向，對嚴複、林紓、魯迅的翻譯做出各自相異的解釋。下文即結合具體研究個案，對非理論指導型研究中的幾種常見問題進行說明。

2.2.1 論據欠佳

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選擇合宜的切入面向之後，還須沿著研究思路，列舉客觀充分、令人信服的理據並加以嚴密論證，才有可能對特定現象或問題做出最佳闡釋。有些論者的研究由於論據欠佳，導致對相關現象的解釋看起來較為單薄。例如：

文化保守主義在翻譯中特別明顯地表現在譯文的語言上：嚴複譯西方學術名著用的是古色古香的文言，帶著很濃的桐城派腔調；林紓

譯外國小說也用古文，其心態正如錢鐘書先生說過的那樣，「他認識到，『古文』關於語言的戒律要是不放鬆（姑且不說放棄），小說就翻譯不成。為翻譯起見，他得借助於文言小說以及筆記的傳統文體和當時流行的報刊文本。但是，不知道是良心不安，還是積習難改，他一會兒放下，一會兒又擺出『古文』的架子」。思想上的拒斥或半推半就，其例更多，這裡就不去展開了（顧鈞、顧農 1999: 13）。

這位論者在此試圖以「文化保守主義」來解釋嚴複、林紓為何用古文進行翻譯。論及林紓時，其引述錢鍾書在《林紓的翻譯》一文中的原話來佐證自己的觀點。然錢鍾書關於林紓翻譯時具體心態的分析其實和論者提出的「文化保守主義」並無關聯。而且，若查閱《林紓的翻譯》原文，便會發現錢鍾書作此分析的初衷在於解釋為何《巴黎茶花女遺事》比其他林譯小說語言晦澀，並非意在解釋林紓為何用古文翻譯西洋小說⁶（錢鍾書 1981: 42）。

還有論者（谷婷婷、韓建萍、田穎慧 2013）列出這樣兩條論據來論證嚴複的古文翻譯是出於對當時歷史背景的考慮。其一，「嚴複生活在封建殘餘與西方新文化興起互相交織的舊時代，當時人們還是崇尚讀古文，白話文並不受重視，嚴複要想介紹西方先進的學術思想，尤其受到上層階級的重視，就必須適應當時的規則」；其二，「他從小受私塾教育，青年時

⁶ 錢鍾書在《林紓的翻譯》一文中提及此處的原文為：「在林譯第一部小說《巴黎茶花女遺事》裡，我們看得出林紓在嘗試，在摸索，在搖擺。他認識到，『古文』關於語言的戒律要是不放鬆（姑且不說放棄），小說就翻譯不成。為翻譯起見，他得借助於文言小說以及筆記的傳統文體和當時流行的報刊文體。但是，不知道是良心不安，還是積習難改，他一會兒放下、一會兒又擺出『古文』的架子。古文慣手的林紓和翻譯生手的林紓仿佛進行拉鋸戰或蹺板遊戲，這種忽進又退、此起彼伏的情況清楚地表現在《巴黎茶花女遺事》裡。那可以解釋為什麼他的譯筆比其它林譯晦澀、生澀、『舉止羞澀』，緊跟著的《黑奴籲天錄》就比較曉暢明白。」

雖到國外受過西方教育，思想相對比較開化，但是當時封建殘餘的思想根深蒂固，他晚年，思想更加趨於保守，主張恢復帝制，並在五四運動時期反對白話文運動」（同前 7）。第一條論據若從史實角度來看，可以桐城派在當時文壇的地位及桐城古文的影響力為證。第二條論據亦符合史實，但嚴複生平與思想的晚年階段一般認為自 1912 年民國成立至 1921 年其去世，他致力於著述與翻譯則主要在 1894 年甲午戰爭至 1912 年民國肇建之間（黃克武 1998: 40），因此，論者提到的嚴複晚年的保守思想及對帝制的支持和白話文運動的反對在很大程度上並無直接影響到其多數的翻譯著作。也就是說，論者的第二條論據並不能充分佐證其論點。

2.2.2 論證不力

有些學者對於翻譯問題或現象闡釋時，其所舉論據並無偏差，但在結合具體論據進行論證的過程中，由於邏輯問題、推演有誤或其他論證層面的不足，導致整體論述未能擊中要害或無懈可擊。

有論者透過對魯迅「直譯」主張背後動機的分析，認為「魯迅堅持直譯的態度，與他有意識地要改變人們的閱讀習慣和思維習慣有著深刻的聯繫」（孫郁 1991: 37）。其在具體分析中，首先引述魯迅在《關於翻譯的通信》裡的原話作為論據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魯迅說：『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訣，是在避去熟字，刪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講書，也必須借助於粉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糊塗。倘若永遠用著糊塗話，即使讀的時候，滔滔而下，但歸根結底，所得的還是一個糊塗的影子。要醫這病，我以為只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後來便可以據為己有。這並不是空想的事情。』」（同前）。那麼，他又是如何藉此論據來進

一步論證魯迅欲改變民眾思維習慣、閱讀心理與其直譯翻譯主張間關係的呢？論者從這段論據中總結出「魯迅從中國語文的特點中，找到了中國人思維上的缺陷」這一觀點，然後，開始圍繞「如何改變人的思維方式」的問題展開論證。論者提出「改變人的思維方式，除了思想上的革命外，語言文字的變革是異常重要的」，因為「魯迅從翻譯中體會到，如不對詞語進行限定，那種先於邏輯的語法特徵，必將使人的思維陷入長久的混沌狀態。語言是思維的符號，人的思維是藉助語言來實現的」（同前）。接著，順此邏輯進一步推演，「而語言變革的重要途徑，就是靠外來語的衝擊與融合。魯迅的直譯，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對傳統閱讀心理的校正」（同前）。這位論者整體的論證思路可概括為：改變人的思維方式要從語言變革開始，語言變革要「靠外來語的衝擊和融合」來實現，引起「衝擊和融合」的外來語的表現方式又可依靠直譯方法來引進。這一條線的論證看似環環相扣，實則背道而馳。此例中的論述為因果探究，魯迅的「直譯」主張是「果」，論者需要提供合理的論據並輔以嚴密的推理論證，來由果索因。若將論者的整體論證進行細梳，不難發現，要改變人的思維習慣即是此研究個案中論者索到的「因」。論者在舉出魯迅的原話作為論據後，直接擺出「因」，然後又由「因」指向「果」。至於如何得出此「因」，從何得知魯迅欲改變國民思維習慣及閱讀心理，論者並未指明。由因及果是常見的邏輯推理方式，但此案例的實際情形需要論者由果索因，「因」才是論者要得出的研究結論。該論者在論述中，還未進行論證，便給出結論，然後又以該結論為出發點進行循環推論，這樣「倒因為果」式的論證邏輯確有不當之處。

同樣以魯迅的這段話作為論據來分析其「直譯」主張，另一位學者得出結論：「魯迅在提出文句上的『直譯』，甚至是『連語句的前後次序也不甚顛倒』的翻譯方法時，背後有著一個對中國語文的理解，就是漢語極不

完備，無法充分表達複雜的思想內容」（王宏志 2011: 289）。這位學者在具體論證過程中，首先引出魯迅的原話作為論據，「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訣，是在避去熟字，刪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同前）；並且，還舉列出瞿秋白與魯迅通信中的回覆——「在這方面，魯迅與瞿秋白的看法是一致的。瞿秋白甚至說得更徹底、更激烈：『中國的言語（文字）是那麼窮乏，甚至於日常用品都是無名氏的……一切表現細膩的分別和複雜的關係的形容詞，動詞，前置詞，幾乎沒有』（同前），以此來強化魯迅認為中國語文存在缺陷這一觀點。然後，將二人對於中國語文的看法置於他們生活時代的歷史背景之中，結合「從清末中國屢經外國列強戰敗開始，不少人便認為中國語文是中國積弱的主因，於是有改革語文的原因」（同前）這一史實，進一步說明「這種對中國語文的負面評價」及改革中國語文乃當時的一個主流觀念，「不是魯迅或瞿秋白所獨有或獨創的」。接下來，論者又以瞿秋白給魯迅回信中的原話「翻譯，的確可以幫助我們造出許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豐富的字彙和細膩的精密的正確的表現」和「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翻譯《聖經》，大力推動了現代德語的建立」的例子來推出「魯迅和瞿秋白更進一步賦予了翻譯另一個特殊功能，就是幫助中國語文的改革」（同前）。隨後，又引述魯迅通信的原話來論證其關於如何通過「直譯」來改造中國語文的看法：「魯迅認為在輸入新表現法時，『只好陸續吃一點苦』，也就是『裝進異樣的句法』……他這樣說：『一面儘量的輸入，一面儘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傳下去了，渣滓就聽他剩落在過去裡。……但這情形也當然不是永遠的，其中的一部份，將從「不順」而成為「順」，有一部份，則因為到底「不順」而被淘汰，被踢開。』就是這樣，中國的語言才能豐富起來。」（同前 291）在此個案中，論者的闡述從整體來看，每一步推論都直接相關於上一步論證並

指向下一步推論，即每一步推論都既是上一步的果，又是下一步的因，銜接緊湊，體現出邏輯縝密和論證嚴謹的一面。就論據的角度而言，瞿秋白回覆魯迅的原話與魯迅的觀點在論者的闡述中前後呼應，並不斷為論者下一步的論證「打頭陣」，不但令論據更加充分、全面，亦增添了論述的整體說服力。

3. 討論

上文結合具體案例，對當前中國大陸學者中間運用不同方法進行個案研究時常見的一些問題做以說明。這些問題從側面反映了就翻譯研究的現狀而言，中國大陸學者在研究能力層面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亟待改進，這些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3.1 對西方理論的認識及運用欠佳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的翻譯研究先後經歷了兩次西化浪潮，大量西方理論於此時期引入中國。不少學者面對這些理論，採取了借鑒、運用等積極姿態，促進了中國翻譯研究的發展。但同時，也暴露出一些普遍性的問題。其中，「誤解理論」和「以西律中」的問題最為明顯。

3.1.1 誤解理論

一些學者對於西方理論的認識和討論流於表面和空泛，並未真正領悟到其精髓，比如前文提到的對目的論和韋努蒂理論體系中「異化」、「歸化」概念的誤解。還有某些學者將外國純理論理解，甚至修改成應用型理論加以運用（張南峰 2010: 74）。他們從根本上並未意識到許多純理論的出發點在於指導純學術研究，而非翻譯實踐。故而運用這些理論闡釋具體翻譯

現象或活動時，會從相關翻譯實踐基於某種理論影響的角度加以分析。這自然而然會導致理論的誤用。諸如此類的問題一方面源於國內學界長期以來對翻譯理論的重要作用認識不清，不少學者都將指導翻譯實踐視為翻譯理論的首要功用，忽視了理論之於學術研究的價值和意義；另一方面，可歸咎於「中國的理論建設強調以實踐為主導，較少探討『翻譯究竟是什麼』，『翻譯之所以為翻譯建基於什麼哲學基礎』等本體論問題」（張佩瑤 2012: 148）。

3.1.2 以西律中

很多當代翻譯理論源於外國學者對於國外文化語境中翻譯作品或現象的研究，且有些研究針對某一具體的時間跨度。某些理論照搬式地移植入對中國語境內翻譯現象或活動的闡釋後，可能會由於非量體裁衣，而出現捉襟見肘的情況。或者，時常會看到有些文章與其說是「運用」某種西方理論來研究特定對象，不如說是選擇了某些明顯事例來「證明」該理論，中國的翻譯現象成為了西方理論的註腳。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西方理論不能用於闡釋中國語境下的翻譯現象或問題，因為科學理論的一個特點即在於具有一定的普適性，但該種普適性並不同於可放之四海而皆准。前文分析的運用多元系統論闡釋嚴複、林紓和魯迅翻譯的研究個案即可視為一個很好的範例。論者並沒有把埃文·佐哈爾的理論直接生搬硬套在這三家的翻譯上，僅從清末民初中國文化多元系統隨著整個社會陷入危機而出現「虛弱」或「真空」狀態，翻譯文學得以進入中國文學多元系統中心的層面考慮，進而得出該時期的譯文會因此具有更高「充分性」之類的結論；他而是透過分析古文語言系統在當時中國語言文學系統中的地位得出合理的解釋。由此可見，面對具體的研究對象時，必須對其背後的文化語境和所用理論背後的文化語境所決定的適用範圍瞭解透徹，才能在實際的研

究過程中切中肯綮，避免綆短汲深、削足適履。

3.2 缺乏嚴謹、客觀的話語立場

科學研究的一大宗旨在於求真、求知，為達此目的，研究者在相關表述中要盡可能堅持嚴謹、客觀、不偏不倚的話語立場。然而，很多中國大陸學者在研究中偏離了此種立場，這主要反映在如下兩個方面。

3.2.1 主觀臆測

推測對於學術研究而言，尤其是人文研究，有時無以避免。學術研究中，只有盡可能列舉出充分的證據，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合理、嚴密的論證，所做推測及研究結論才會令人信服。如前述研究個案中，論者舉出魯迅與瞿秋白通信中二人的原話為論據，並輔以語境化分析（見王宏志 2011: 289-291），使其論述有據可依、以理服人。然而，一些大陸學者往往僅憑主觀印象或猜測便妄下結論，研究信度與效度因此大打折扣。有論者在探討嚴複的翻譯思想時，這樣說：「1895 年春前後的嚴複，仕途無望，社會劇變，身心疲憊，本來受熏於中學，此時又一頭紮進西學，其翻譯思想不能不受古代文論和古代翻譯思想的影響」（黃忠廉 2009: 8）。這位論者得出古代文論和古代翻譯思想影響了嚴複個人翻譯思想這一結論的依據是嚴複在特定時期的生活經歷。但顯而易見，這二者之間並無直接因果關聯，論者也並未說明古代文論和古代翻譯思想以何種方式影響了嚴複個人的翻譯思想，因此，這樣的結論難免有主觀臆測之嫌。

還有學者在研究「林譯小說」時說：「林紓的浪漫與豪邁、熱情與正直，林紓的夫子之道和他的生活境遇與時代，註定了會產生我們瞭解或者閱讀過的林譯小說」（賀志剛 2004: 43）。任何個人的創作或翻譯活動都不可能在「真空」狀態中完成，林紓生活時代的社會、歷史因素及其個人氣

質、性格都有可能於某種程度上對其翻譯活動產生影響，但是否為決定性影響，應對具體史實加以科學分析方可定奪，否則僅憑個人主觀印象得出的如上結論實在值得商榷。

3.2.2 價值判斷

學術研究中，對研究對象做出的判斷應以客觀事實為依據，以學術規範為準繩。也就是說，針對研究對象的判斷應為「事實判斷」，而非「價值判斷」。然而，中國大陸譯學界以至其他人文學科研究領域中，研究者對研究對象進行價值判斷的現象並不罕見（張南峰 2010: 74）。有些學者忽視研究對象涉及的社會文化因素的複雜脈絡，有意無意間從主觀認識出發，對研究對象加以判斷。如此得出的結論缺乏客觀理據，帶有較強的價值判斷色彩。例如，有論者這樣評論林紓及其文學活動：「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反面作家林紓，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鐵案是永遠翻不了的」（張俊才 1983: 151）。究竟什麼樣的作家算做是「反面作家」？「反面」一詞如何界定？這都涉及到以何種標準可以斷定林紓是「反面作家」。類似的疑問若在具體研究中沒有得到清楚的闡釋和合理的論證，那麼對於研究對象的判斷就是基於研究者個人價值觀的價值判斷。而且，這樣的判斷時常違背客觀事實。

再看下面幾例對嚴複「信達雅」翻譯主張的評論：

信達雅是翻譯標準的客觀反映。（黃任 1996: 39）

不管怎麼說，「信達雅」三一律理論的提出，繼往開來，言簡意賅，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只要我們正確理解，合理解釋，仍不失為譯界的「金科玉律」。（趙秀明 1996: 43）

嚴復於中國譯界赫赫之功就在於其翻譯標準的厘定。他在《天演論·譯例言》中開門見山，戛戛獨造饒當當提出「譯詩三難，信達雅」。至此，結束了中國譯界自漢至清在翻譯標準探索中的蒙昧狀態，亦使後人的譯論研究莫出其右，真可謂空前絕後！（同前 39）

「信达雅」在中國翻譯史上的影響毋庸置疑，但是否為「客觀反映」、「金科玉律」、「空前絕後」式的翻譯標準，應訴諸理性，置於翻譯史的脈絡之中予以客觀評價。如此這般的價值判斷主觀色彩較濃，並不能夠服人，亦無學術意義。

以上所述不足之所以出現，並非僅與學者個人原因相關，從更深層次來看，與中國的學術傳統和翻譯學在中國大陸的學科發展情況有一定關聯。

一、中西學術傳統之差異

現代意義上的「學術」概念源自西方，且在西方的主流認識中，「學術」具有非實用性特點，可視為「學者在『象牙塔』中進行的『為學術而學術』的『純學術』探索工作」（李伯重 2005: 8）。中國的學術傳統偏重「經世致用」型的應用科學，忽視探索無實用價值、純粹理性知識的理論科學，這與西方「為學術而學術」的旨趣大相逕庭。同西方的知識論相比，中國的知識論有很強的實踐論色彩，博學是爲了篤行，傳統知識分子的學是爲了優則仕（林傑 2010: 20）。陳獨秀在痛陳中國學術落後時，就提到當時的學者「多功用之想，少敬畏之心」（陳獨秀 1965: 58）。中國學術傳統的此種實用主義傾向，導致中國學術界輕純學術研究，重應用型研究。由此，很多中國學者都質疑純理論和純學術研究的價值，或者對很多國外純理論的理解僅停留於表面層次，未能深入瞭解其真正內涵。反映到翻譯研究這一學科中來，雖然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將目光投向西方理論，但

不少學者由於對一些純理論的認識流於表面，在對具體翻譯現象或問題進行純理性探索時，時常出現誤用理論或加入實踐角度分析等現象。

就治學方法而論，西方學術研究的方法論傳統「重概念思辨，重理論推演」（林傑 2010: 20），尚實證分析；但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卻與此迥然相異。中國傳統認識論相信「天人合一」，沒有把個人與宇宙清晰地一分為二，致使物我不分，「客觀實在沒有成為自覺的『我』的研究對象」（同前 21）。因而，傳統知識分子在研究過程中，很多情況下，並不訴諸理性方法，且不尚分析，而是慣於依據直覺感驗進行內省式的判斷。嚴複就曾說，「中國士人，經三千年之文教，其心習之成至多，習矣而未嘗一考其理之誠妄」（嚴複 1986: 1050），意即中國的學術研究多主觀推測，乏實證精神。這一傳統反映到具體研究中，從方法論角度來看，體現為「長於模糊、抽象的定性概括而弱於條分縷析的量化陳述，長於隨感而疏於實證，重點評和個人經驗而輕概括和理論提升」（廖七一 2001: 15）。另外，中國的哲學傳統未從本質上將探究範疇限於客觀事物或事實，而是將其延伸至價值、美德和終極實在性，並由此導致「在依靠倫理治國的古代中國必然將知識追求與價值判斷牽扯在一起」（林傑 2010: 22）。因此，許多中國的傳統學者在研究中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加入自己的價值判斷。然而，這種做法恰恰與西方學術規範中追求真理、不偏不倚的理念背道而馳。

二、翻譯學科及翻譯研究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近三十年來，中國的翻譯研究發展迅速，並呈現出日漸蓬勃的態勢。目前，翻譯學在中國大陸已成為獨立學科，其學科地位近幾年內得到廣泛認可和進一步鞏固（孫藝風 2012: 12）。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大陸範圍內翻譯學這一學科及翻譯研究的發展已與國際全面接軌。就現狀而言，中國大陸在翻譯教育和翻譯研究涉及的學科間對話、交流機制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

（一）學科教育

中國大陸的翻譯教育隨著翻譯學獨立學科身份的確立，近年來不斷進步和發展。很多大學和研究機構相繼開設翻譯相關課程，一些大學並成立了單獨的翻譯學院或學系。然從整體而言，仍在理論教育、方法論指導及學術規範意識培養等方面有待改進。

（1）理論教育與方法論指導不足

翻譯教學研究在中國大陸原本相對滯後的翻譯研究中，較其他分支領域而言，仍顯落後和稀少（穆雷 2004: 26）。從翻譯課堂教學角度來講，中國大陸的翻譯教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對具體教學過程中涉及的教學內容設計、研究方法傳授等方面的影響和指導作用較為有限。加之，中國的翻譯事業從整體來看，翻譯實踐較為突出，翻譯理論研究相對滯後，並與國際水平存在較大差距，進一步制約了中國翻譯教學及研究的發展（同前 25-26）。此種情形反映在具體的翻譯教學過程中，暴露出現時存在於理論教育和方法論指導方面的一些不足之處。目前，中國大陸地區高校的翻譯教育覆蓋本科、碩士和博士三個層次。本科階段的翻譯教育主要偏重翻譯實踐訓練，旨在培養學生的實務翻譯能力。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階段的翻譯教育，雖以培養學生的翻譯研究能力為一大教學目標，但不乏翻譯教師對翻譯理論之於翻譯研究及研究能力培養的重要角色缺乏認識。某些教師以理論並非一定能夠直接指導翻譯實踐或提高翻譯能力為由輕視理論的作用，並由此導致忽視研究生理論意識和素養的培養。另外，在中國大陸，極少學校為翻譯專業的研究生開設專門的翻譯研究方法論課程（穆雷 2005: 56）。而且，部份教師對研究方法的認識尚不到位，更遑論在針對研究生的具體翻譯教學中，提供正確的方法論指導（許鈞、穆雷 2009: 87）。此種情形易導致翻譯專業研究生學術研究基底先天貧弱。從長遠來看，既不利於青年學者的個人學術發展，亦為整個中國翻譯研究學術隊伍的培養

埋下深重隱患。

(2) 忽視學術規範意識的培養

任何學科的科學研究，都應在學術規範允許的範圍內進行。針對不同學科的學術研究，有特定的學術規範需要研究人員遵守。但同時，也有一些普適性的學術規範對所有學科的科學研究發揮等同的約束效力，例如不偏不倚的研究立場、客觀中立的對象描述等。前文所述中有些研究個案存在的主觀臆測、價值判斷等問題，其實側面反映出研究者在某種程度上對於一些普適性學術規範的忽視。此種情況不僅翻譯研究領域獨有，在其他人文學科中也較常出現。究其原因，一方面，學術系統源於西方文化語境，國際通行的現代學術規範大體遵從西方學術系統的標準。這樣的系統和規範引入中國後，由於中國的文化語境與其植根的西方文化語境有所差異，於是與中國的學術傳統發生衝突。因此，一些學術規範在中國難存原貌或易受忽視（張南峰 2010: 76）。另一方面，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在學術規範教育方面未予以足夠重視。港、台地區及國外的大學中，本科教育階段就開始樹立學生的學術規範意識，研究生的初期課程中亦將學術規範的相關內容納入必修課目之中。然而，中國大陸地區的大學很少專門向學生講授學術規範，以至於很多研究生畢業後仍對某些學術規範意識欠佳，在研究中有意無意間違背學術規範。

（二）關於學科間交流與對話機制的現狀

翻譯研究目前已公認為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從其各自的學科視角切入探討翻譯問題，不僅為翻譯研究帶來不少洞見與啟發，亦為該領域拓展了研究疆界。但研究不管以何種學科角度出發，於何種面向進行探索，終究要「殊途同歸」（孫藝風 2012: 12）。這就需要不同學科背景的翻譯研究者跳出各自相對獨立的學科視域，建立有效的對話和交流機制，互通有無，取長補短。這不僅可以開闊研究者個人的研究視

野和思路的開闊，亦有利於多學科影響之下翻譯研究的長期發展。然而，以目前中國大陸翻譯研究的現狀而言，很多非翻譯學領域的學者雖在個人研究中探索意識很強，但由於對於翻譯研究及翻譯學這一學科的整體發展趨向把握不夠，對一些翻譯理論的認識及討論「蜻蜓點水」，而且並未與自己討論的具體文本或現象真正結合起來，因此難免受到翻譯學專業學者的指摘（同前 11）。此種情形即與不同學科間對話和交流機制的欠缺有關。各學科的研究者各走各路，彼此較少對話或交流，就會造成很多情況下，具體的翻譯研究中對某些問題的探討僅能停留在表層或某個階段，並未真正觸及其本質。同時，我們還應注意，翻譯研究領域的開放性及翻譯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係在促進翻譯研究的面向日趨豐富的同時，亦對研究者提出了挑戰。翻譯研究涉及的廣泛知識面，常常要求研究者「遊走」於不同學科之間。有關特定對象的翻譯研究，需要研究者對該對象所在領域的專業知識有一定瞭解，並意味著研究的具體過程中，可能會觸及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Tymoczko 2007: 141）。學科間對話和交流機制的有效建立，正可以為不同領域的學者互通有無、相互啟發提供機會和平臺，並進一步促進當代翻譯研究的多元發展。

4. 結語

本研究從具體案例入手，對翻譯研究中方法論層面常見的一些問題予以分析，並進一步探討這些問題背後反映出的目前存在於中國譯學界的一些普遍性問題及其致因。通過上文分析，可以看到中國大陸的部份翻譯研究者無論在理解、運用西方翻譯理論、研究範式方面，還是在對現代學術規範的認知層面，都有所欠缺。而此種現象在某種程度上，與中西學術傳統的差異及當前中國大陸的翻譯研究和翻譯學科教育的現狀有一定關

係。研究方法不僅直接關係到翻譯研究成果的優劣，甚至可能會引起研究範式的改變，以至於對整個學科發展產生影響。因此，必須得到重視。針對本文提及的中國大陸地區翻譯研究存在的方法論層面的問題和差距，筆者試從以下三個方面做出建議：

一、在翻譯專業研究生的課程設置中，增添翻譯研究方法論課程。同時，注重對研究生理論意識和學術規範意識的培養，為中國翻譯研究的青年學者隊伍打好根基。

二、重視理論探索。對現有理論的普適性和闡釋力進行探究，並不斷發展和完善翻譯理論體系。

三、建立學科間對話、交流的長效機制。擴大研究視域，通過學習和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為翻譯研究引入多元化的研究模式。

參考書目

- 王宏志。《翻譯與文學之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 李伯重。〈論學術與學術標準〉。《社會科學論壇》3（2005年）：5-14。
- 谷婷婷、韓建萍、田穎慧。〈嚴複「信、達、雅」傳統翻譯標準探析及其所面臨的挑戰〉。《學術研究》9（2013年）：6-8。
- 林傑。《西方知識論傳統與學術自由》。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 姜秋霞，楊平。〈翻譯研究理論方法的哲學範式——翻譯學方法論之一〉。《中國翻譯》6（2004年）：10-14。
- 孫郁。〈魯迅翻譯思想之一瞥〉。《魯迅研究月刊》6（1991年）：31-38。
- 孫藝風。〈當前翻譯研究存在的問題與對策〉。《中國翻譯》4（2012年）：11-12。
- 徐蕾，李里峰。〈嚴複譯著與「翻譯的政治」〉。《廣東社會科學》2（2006年）：107-114。
- 張佩瑤。《傳統與現代之間——中國譯學研究新途徑》。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
- 張俊才。〈林紓對「五四」新文學的貢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4（1983年）：151-165。
- 張南峰。〈以「忠實」為目標的應用翻譯學——中國譯論傳統初探〉。《翻譯學報》2（1998年）：29-41。
- 張南峰。〈翻譯研究、學術規範與文化傳統〉。《中國翻譯》2（2010年）：73-95。
- 張南峰。《多元系統翻譯研究——理論、實踐與回應》。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

張美芳，王克非主譯，Christiane Nord 著。《譯有所為：功能翻譯理論闡釋》(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

張景華、白立平、蔣驍華主譯，Lawrence Venuti 著。《譯者的隱形：翻譯史論》(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

許鈞，穆雷。〈中國翻譯學研究 30 年 (1978-2007)〉。《外國語》1 (2009 年)：77-87。

郭建中。〈韋努蒂訪談錄〉。《中國翻譯》3 (2008 年)：43-46。

陳獨秀。《獨秀文存 (卷二)》。香港：遠東圖書公司，1965。

賀志剛。〈林紓和林紓的翻譯〉。《國外文學》2 (2004 年)：42-47。

黃任。〈重溫「信達雅」〉。《外語研究》4 (1996 年)：39-43。

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臺北：允晨文化，1998。

黃忠廉。〈適應與選擇：嚴復翻譯思想探源〉。《上海翻譯》4 (2009 年)：7-11。

廖七一。〈研究範式與中國譯學〉。《中國翻譯》5 (2001 年)：14-18。

趙秀明。〈從「信達雅」說開去〉。《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1 (1996 年)：39-44。

穆雷。〈翻譯教學發展的途徑〉。《中國翻譯》9 (2004 年)：25-26。

——〈翻譯學研究生教學探討〉。《中國翻譯》1 (2005 年)：56-61。

錢鐘書。《林紓的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閻愛花。〈目的論視角下對魯迅異化翻譯策略的解讀〉。《語文建設》6 (2012 年)：50-51。

羅列、穆雷。〈翻譯學的學科身份：現狀與建設〉。《上海翻譯》4 (2010

年)：11-15。

嚴複。〈《穆勒名學》案語〉，《嚴複集》(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顧鈞、顧農。〈魯迅主張「硬譯」的文化意義〉。《魯迅研究月刊》8 (1999年)：12-16。

Chesterman, Andrew. A causal model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In Maeve Olohan (ed.), *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pp. 15-27).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0.

Even-Zohar, Itamar. "Polysystem Theory."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 Today*. 11.1(1990): 9-26.

Even-Zohar, Itam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p.192-197). London: Routledge, 2000.

Hermans, Theo (ed.).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I: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2.

Olohan, Maeve (ed.). *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0.

Pym, Anthony.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8.

Tymoczko, Maria. *Enlarging translation, empowering translation*.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7.

Williams, Jenny & Chesterman, Andrew. *The Map: 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2.